



同文馆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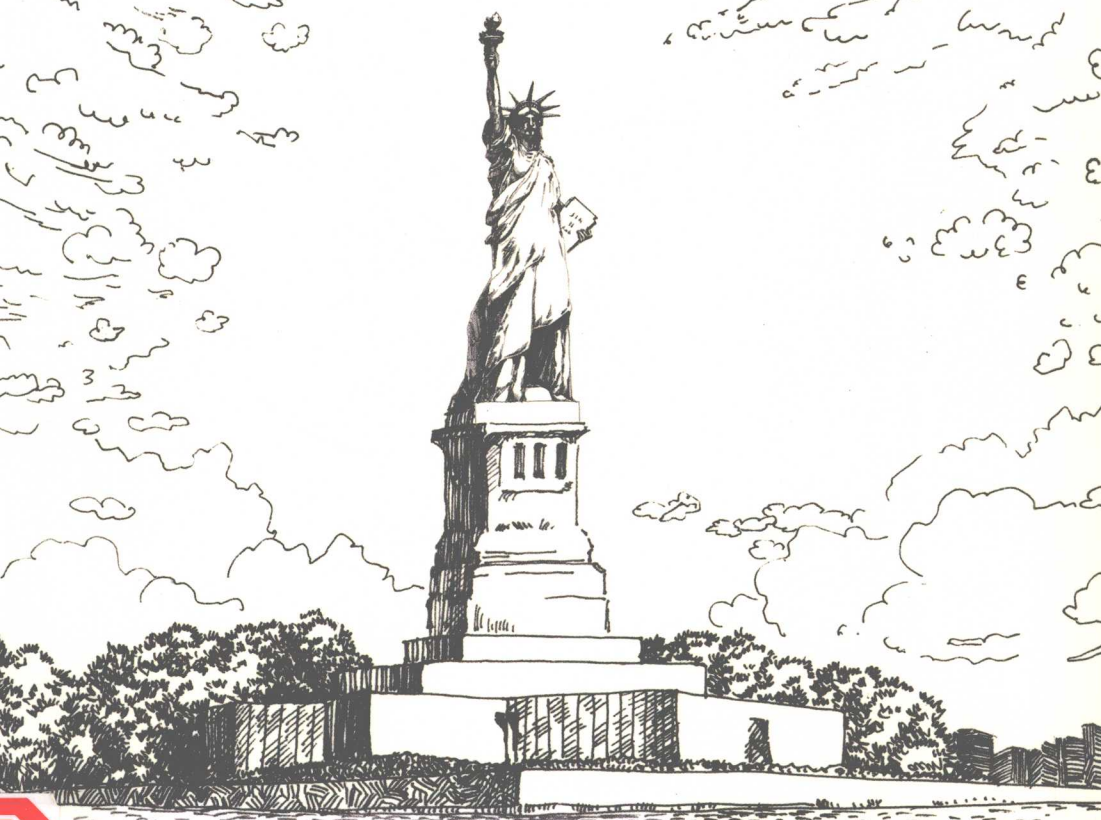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

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

〔美〕斯蒂文·费什米尔 著

徐鹏 马如俊 译

张驰 校



John Dewey and Moral Imagination

Steven Fesmi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B712.51
F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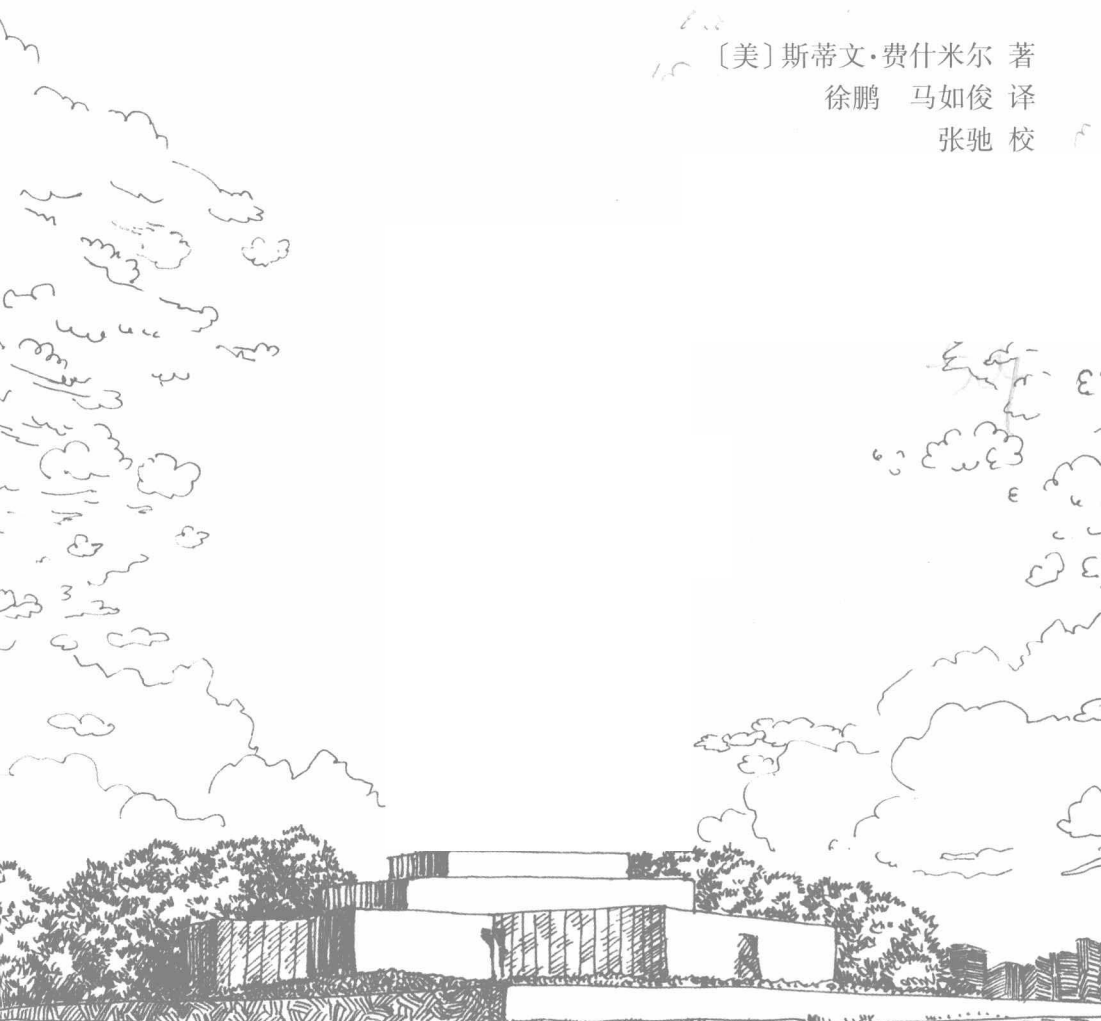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

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

〔美〕斯蒂文·费什米尔 著

徐鹏 马如俊 译

张驰 校



John Dewey and Moral Imagination

Steven Fesmire

B712.51

F3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48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美)斯蒂文·费什米尔
著;徐鹏,马如俊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385-6

I. 杜… II. ①费…②徐…③马… III. 杜威,J. (1859—1952)—实用主义—伦理学—研究 IV. B712.51 B82-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8202号

JOHN DEWEY AND MORAL IMAGINATION, by Steven Fesmire. ©
2003 by Steven Fesmir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li-
cens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publish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伦理学中的实用主义

著作责任者: [美] 斯蒂文·费什米尔 著 徐鹏 马如俊 译 张驰 校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85-6/B·086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4.75印张 22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将他们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论: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中,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美国的大学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刚开始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

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致 谢

本书的写作弥历时日。十多年前,在我攻读学位期间,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Alexander)(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奥尔根大学)激发了这一创作的灵感。我深深地感激他们历久弥坚的支持、鼓励与友谊。

我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审(reviewers),尤其是道格拉斯·勃朗宁(Douglas Browning)(得克萨斯-奥斯丁大学),感谢他们不管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的无以替代的帮助。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默特森(Dee Mortensen)在编辑方面的专心致志,也得益于卡罗尔·肯尼迪(Carol Kennedy)的拷贝编辑工作(copyediting)。

书中的许多观念首先在美国哲学促进会的会议上提出过。与每年一度的美国哲学夏季研究会(Summer Institute of American Philosophy)一起,美国哲学促进会一直是我保持青春的源泉。在此一方面或彼一方面对本书的各部分提供过帮助者包括:查理纳·海多克·塞格弗里德(Charlene Haddock Seigfried),文森特·卡拉皮特罗(Vincent Colapietro),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迈克尔·艾尔德里奇(Michael Eldridge),约翰·麦克德谟特(John McDermott),彼得·海尔(Peter Hare),约翰·拉克斯(John Lachs),格里高里·帕帕斯(Gregory Pappas),米卡·海斯特(Micah Hester),凯斯·哈斯金斯(Casey Haskins),路易斯·韩(Lewis Hahn),玛丽·玛格达-瓦德(Mary Magada-Ward),托德·莱肯(Todd Lekan),戴维·赛皮尔(David Seiple),乔·贝茨(Joe Betz),赫尔曼·萨特卡姆(Herman Saatkamp),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艾因·麦肯纳(Erin McKenna),单农·苏利文(Shannon Sullivan),菲利普·麦克雷诺德(Phillip McReynolds),约翰·舒克(John

Shook), 兰道尔·奥克希尔(Randall Auxier)。我同时要感谢拉尔夫·斯利帕尔(Ralph Sleeper)对我早年研究詹姆斯的鼓励。

本书第二部分大部分草稿完成于我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期间。我尤其感激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与伯纳德·吉尔特(Bernard Gert)的慷慨相助,并感激贝克尔图书馆(Baker Library)成员以娴熟的技术协助搜索论文。

许多学生和同事曾经参与手稿的完善工作。我极大地得益于来自西纳学院(Siena College)的雷伊·博伊斯沃特(Ray Boisvert)和保罗·桑提理(Paul Santilli)的批评性反馈意见与支持,我对理查德·戈夫尼(Richard Gaffney),詹妮弗·麦克俄林(Jennifer McErlean),约翰·波尔肯(John Burkey)和西尔维亚·本索(Silvia Benso)诸君所给予的同事间的支持致以谢意。在我于东田纳西州立大学开始某些章节的初创阶段,休·拉佛里特(Hugh Lafollette)和约翰·哈德维奇(John Hardwig)提出了很有帮助的批评意见,在那里我同时得益于与约翰·查沃德尼(John Zavodny),凯斯·格林(Keith Green),尼亚尔·单克斯(Niall Shanks),杰夫·古尔德(Jeff Gold),保罗·塔迪寇(Paul Tudico),盖尔·斯坦斯达德(Gail Stenstad),吉姆·斯宾塞(Jim Spence)和玛丽亚·格拉芙斯(Marie Graves)诸君之间的意见交流。

深情的谢意致予肯·凯斯(Ken Keith)与康妮·凯斯(Connie Keith),为了他们贯彻始终的友谊、激励和帮助。我同时非常感谢肯·弗斯(Ken Vos),杨·雅克布斯(Jon Jacobs),已故的莱勒·艾迪(Lyle Eddy),杜威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我的父母韦恩·费什米尔(Wayne Fesmire)与金妮·费什米尔(Jayne Fesmire)。我对在智慧园地里悉心栽培我的拉斯基·麦金泰尔(Rusty McIntire),迈克尔·米提亚斯(Michael Mitias),斯蒂芬·施密斯(Steven Smith)和泰德·阿蒙(Ted Ammon)表示感谢。

在青山学院(Green Mountain College)这个新的岗位上,我感到威廉·苏普(William Throop),瑞贝克·普丹(Rebecca Purdom),梅瑞尔·布鲁克斯(Meriel Brooks),菲利普·阿柯曼-莱斯特(Philip Ackerman-Leist),迈克尔·布拉斯特(Michael Blust)以及其他诸君令我

感佩的日以增进的友谊与思维活力。犹如诗人戴维·巴比尔 (David Budbill) 所描绘的佛蒙特那样:“此地有隐逸般的宁静,风物中和有致,深藏不露的壮观。”

从海瑟·凯斯 (Heather Keith) 身上,我领会了,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将我们个人之善与那些与我们互助合作的人们之善融而为一的意蕴。我将这部书献给她,我最亲爱的朋友和同道。

我还要满怀感激地承谢准许重印,以实质上修改了的形式,来自下列论文的材料:

“Ecological Humanism: A Moral Image for Our Emotive Culture,” *The Humanist* 61, no. 1 (2001): 27–30.

“Philosophy Disrobed: Lakoff and Johnson’s Call for 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4, no. 4 (2000): 300–305.

“Morality as Art: Dewey, Metaphor, and Moral Imagin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5, no. 3 (1999): 527–550.

“The Art of Moral Imagination,” in *Dewey Reconfigured: Essays on Deweyan Pragmatism*, ed. Casey Haskins and David Seiple (Albany: SUNY Press, 1999), 133–150.

“Remaking the Modern Mind,” *Southwest Philosophy Review* 14, no. 2 (1998): 65–81.

“The Social Basis of Character,” in *Ethics in Practice*, ed. Hugh Lafollett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7), 282–292.

“Dramatic Rehearsal and the Moral Artist: A Deweyan Theory of Moral Understand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1, no. 3 (1995): 568–597.

文献缩写表

对杜威著作的引用是 37 卷的鉴定版,由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乔·安·博伊斯顿(Jo Ann Boydston)。引文给出文本缩写,系列论文缩写,卷目与页码随后。

选集系列缩写

EW	早期著作(1882—1898 年)
MW	中期著作(1899—1924 年)
LW	晚期著作(1925—1953 年)

文集缩写

1908 E	《伦理学》,1978 年(1908 年),MW 第 5 卷
DE	《民主与教育》,1980 年(1916 年),MW 第 9 卷
EEL	《实验逻辑》导言,1985 年(1916 年),MW 第 10 卷
RP	《哲学的重建》,1982 年(1920 年),MW 第 12 卷
HNC	《人性与行为》,1983 年(1922 年),MW 第 14 卷
EN	《经验与自然》,1981 年(1925 年),LW 第 1 卷
PP	《公众及其问题》,1984 年(1927 年),LW 第 2 卷
QC	《确定性的寻求》,1984 年(1929 年),LW 第 4 卷
ION	《新旧个人主义》,1984 年(1929 年),LW 第 5 卷
QT	“定性思维”,1984 年(1930 年),LW 第 5 卷

TIF	“道德中的三种独立因素”,1984 年(1930 年), LW 第 5 卷
1932 E	《伦理学》,1985 年(1932 年),LW 第 7 卷
HWT	《我们怎样思考》,1986 年(1933 年),LW 第 8 卷
ACF	《共同信仰》,1986 年(1933 年),LW 第 9 卷
AE	《艺术即经验》,1987 年(1934 年),LW 第 10 卷
LSA	《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1987 年(1935 年),LW 第 11 卷
LTI	《逻辑:探究理论》,1986 年(1938 年),LW 第 12 卷
EE	《经验与教育》,1988 年(1938 年),LW 第 13 卷
TV	《评价的理论》,1988 年(1939 年),LW 第 13 卷
FC	《自由与文化》,1988 年(1939 年),LW 第 13 卷
KK	《知与所知》,1989 年(1949 年),LW 第 16 卷

对威廉·詹姆斯著作的引用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评注版本,由佛莱德里克·布克哈特(Frederick H. Burkhardt),佛利德森·波伍尔斯(Fredson Bowers)及伊格纳斯·斯格拉斯凯利(Ignas K. Skrupskelis)编辑。哈佛版引文之后,随后有一页可更广泛得到的参考版本(两卷本多佛版《心理学原理》,哈奇特(Hackett)版《实用主义》以及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所编的《威廉·詹姆斯论文作品集》)。

xii

《威廉·詹姆斯文集》缩写以及出版日期

PP	《心理学原理》,3 卷本,1981 年(1890 年)
MPML	“道德哲学家与道德生活”(1891 年)
S R	“理性情感”,1979 年(1897 年)
WB	“信仰意志”,1979 年(1897 年)
VRE	《宗教经验种种》,1985 年(1902 年)
PM	《实用主义》,1975 年(1907 年)

MT	“真理的意义”,1975 年(1909 年)
PU	“多元的宇宙”,1977 年(1909 年)
ERE	《彻底的经验主义》,1976 年(1912 年)

目 录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1

致 谢/1

文献缩写表/4

导 论 复兴伦理学/1

第一部分 古典实用主义中的性格、信仰与理智

第一章 习惯与性格/ 11

第二章 实用主义转向/40

第三章 理性的实用主义重构/58

第二部分 道德想象力

第四章 实用主义伦理学中的想象力/83

第五章 戏剧排练/104

第六章 杜威的理想/138

第七章 道德艺术家/160

参考文献/192

索 引/200

导论 复兴伦理学

1

假如学院派伦理哲学家们有充分的活力踏进现实生活的园地,就将认识到……屈从于他们所宣讲的僵化模式就等于所有高尚的道德责任的死亡……明辨的眼睛,多方的同情,胆大心细,任劳任怨,永远是一切善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具备这些品性本身即使可以使生活中的艺术家获得成功;而倘若缺乏这些品性,则即使最忠诚于清规戒律的奴隶也只能遭遇灾难。

——哈维罗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
《生命之舞》(*The Dance of Life*)

道德想象力与美国古典实用主义

有关道德行为的争执依然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道德行为是有规可依的还是随心任意的,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对于这一僵局的回应,过去二十年间,众多道德哲学家们业已拒绝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一双面神(Janus faces),并挑战了20世纪主流道德哲学的启蒙基础。^①这就提高了对人类实际上意识到(make sense of)复杂处境与创造充满

① 詹姆斯·古因洛克(James Gouinlock)批判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为“同一假定的双面神”,见《重新发现道德生活》(*Rediscovering the Moral Life*. Buffalo, N. Y.: Prometheus, 1993),第24页。